



中国史家
论苏联
四种

叶书宗 著

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

EGUO SHEHUI ZHUYI SHIJIAN YANJIU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

叶书宗 著

著：叶书宗

编辑：王大为

第一版：1991年
印刷：1991年

元00 份宝壹 ISBN 7-81025-72-9
元正 份宝壹 ISBN 7-81025-72-9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叶书宗著. —合肥:安徽
大学出版社, 2005. 1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ISBN 7-81052-757-6

I. 俄... II. 叶... III. 社会主义—研究—苏联
IV. D75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582 号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

叶书宗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58
发行部 0551-5108397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王先斌
封面设计 张 犇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5
字数 389 千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757-6 / K·57

全套定价: 148.00 元
本册定价: 37.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序

长期以来,中国的苏联史研究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天下,从论点到史料差不多都取自这本“经典”。我国对苏联历史进行独立的、科学的研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事。坏事变好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认真反思和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和诸多问题。错误是我们自己犯的,但从源头考察却是同斯大林模式分不开的。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了对苏联历史的艰难而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本丛书的作者郑异凡、徐天新、叶书宗和杨存堂(笔名柳植)四位教授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有大体相同的特点: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有比较扎实的基本功,能较为熟练地使用俄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有献身于这一学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正因为这样,在我国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在三中全会的鼓舞下,他们对苏联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在报刊上、学术会议上,就苏联历史上的各种问题,诸如列宁晚期思想、斯大林模式、十月革命、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农民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现代化、对外政策、卫国战争、大清洗及布哈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史人物评价诸问题提出不少颇有价值的新见解。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过程。一个问题的研究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这里既有思想解放的问题,也有能接触到的史料问题,甚至还有当时社会环境对提出的论点所能接受的程度问题。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在起步阶段能看到的资

料是非常有限的,而某些人的头脑还在“作茧自缚”,这直接影响到成果的发表。1984年,我曾借《世界历史》发表郑异凡的一篇文章之机写了一篇短评,叫做《没有必要作茧自缚》,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随时代的推移和实践的积累而发展。历史科学也不例外,要勇于并且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选择新的历史课题,对多年争论不休或者不敢问津的老问题提出新的答案。实践证明,在苏联史的研究上,人们的头脑一旦摆脱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束缚,就是根据不多的资料,也能得出新的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某些论证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显得单薄或者不够充分,也许某些论点会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但是,随着资料的发掘,特别是苏联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随着对问题研究的深入,在许多问题上史学界逐渐取得了共识。当然,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完全消除不同意见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我很高兴,在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80年代,有一批包括这四位学者在内的有志于苏联史研究的所内外学者就苏联史上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共同切磋,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在我国形成一个颇具实力的研究群体。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刻苦钻研,他们各自在研究课题上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专著。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他们二十多年来发表的文章选编,^① 这些文章有不少曾经对我国理论界、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对恢复苏联历史本来面貌发挥过重要作用,推动了我国苏联史的研究。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又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结合苏联和俄国的历史,总结一个大国解体、一个大党丧权的教训,评析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事件和现象,苏联史的深厚功底使他们在这方面的文章也有其独到之处。

^① 郑异凡已经出版了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苏联解体期间的文集《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所以郑异凡的《史海探索》只收苏联解体以后的文章。

文化需要积累。为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保存,为使后来的学者能看到他们的成果,保持史学研究的继承性,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本书的出版。这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举措。对历史的认识、对问题的探讨永无止境。这四位学者的文集所反映的是我国对苏联历史探讨研究的一个阶段的历程,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相信随着新档案资料的发表,随着认识的加深,在俄国和苏联历史的研究领域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史学作品问世。

朱庭光

2003年12月

前言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研究文集,是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表的苏联史研究成果中挑选出来的,共 29 篇。结集出版之际,为了阅读的方便,根据各篇文章的内容,编为六个专题,即:还布哈林以清白;苏联的土地、庄稼、人;斯大林模式探究;赫鲁晓夫:振聋发聩;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认识;对苏联剧变的反思,并冠以《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的书名。这些文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的思想;概括了我生活的基本历程;体现了我人生的追求;不言而喻,也载负着我无言的艰辛。

1958 年,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生班。从 1954 年进入大学历史系学习开始,我就钟情于世界史;进国际共运史专业研究生班学习后,更喜爱钻研苏联历史。我之所以喜欢研究苏联历史,除了因为苏联历史构成国际共运史的主干之外,更因为苏联历史充满着神秘色彩,被一张无形的黑幕幔遮得严严实实。而人的好奇本能,总是产生出一种探究的冲动。

研究历史,只要想一想吴晗、翦伯赞,以及我熟悉的、饱学的老师们的遭遇,就让人心寒。至于研究苏联历史,那就更是难中之难、险而又险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领域同样贯串着一条极左路线。史学研究必须形而上学地贯彻“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为了能“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盛行牵强附会、杜撰，直至大搞“影射史学”。而危害之甚，尤数“影射史学”，它使有的人得了不治的“影射思维过敏症”。由于苏联历史和我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太过特殊、太过微妙，因此，苏联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成了学术界的“死亡之海”，绝少有人问津。

研究苏联历史，还因为这方面的资料短缺到“一贫如洗”的境地而更增添了研究的难度。长期以来，作为范本的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此外就是手指头也能数得过来的几套书：《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斯大林文选》，还有几本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想找一些西方学者研究苏联历史的著作，难如古代攀登蜀道。至于想看苏联的历史档案文献，更如海底捞月。

以上这些情况，都是研究苏联历史的客观存在的困难。从主观上说，研究苏联历史至少应当能熟练地阅读俄文、英文书刊；对世界历史、俄国历史以及中国历史，都有系统、全面的知识；要具备较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当然，还应当有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and 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些条件几乎是思考、理解、有分寸地表述苏联历史所应有的。

我从 1954 年进大学读书到现在，如果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正好可以分为前 24 年和后 24 年这样两段。在前 24 年里，不停顿地历尽了“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学习“三面红旗”、“反右倾斗争”、“反修防修学习运动”、“小四清”、“大四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思想之弦，时刻被绷紧到了极点，直到 1978 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缓过气来。在这正值我一生中的精力最旺盛的 24 年里，除了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的三年才认真地读书之外（那三年适逢“暂时困难”时期，贯彻“高教工作 60 条”，强调读书），其余时间，几乎三天两头打起铺盖卷下乡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那 24 年

里,练的基本功是开会;经常敲的木鱼是“警惕走白专道路”;时刻念的经是“书越读越蠢”、“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天天要“夹着尾巴做人”,有时还只能以阿 Q 精神求得自我的心态平衡。这样,我的俄文、英文水平都很低。除此之外,还要忍受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窘迫的程度不会好于中举前的范进。居住状况差,全家蜷缩在一间斗室里,既买不起书,也没有放书的地方。但是,和那些被错划为“右派”以及其他一些同辈人相比较,我仍然属于幸运者,因为我毕竟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高等学校里工作。至今我聊以自慰的是,在那漫长的 24 年里,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过学术研究。而这也成了我在后 24 年里取得苏联史研究的一点成果的条件和基础。

我说这些话,丝毫没有自怨自艾的意思;我只是想说,20 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的艰难,而又多么伟大、壮丽!

20 世纪是中国告别几千年的传统,进入现代社会的世纪;或者说,中国历尽艰辛,方始阔步迈入现代社会。

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灭亡中国的全民神圣抗日战争为代表的民族解放战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迎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脱胎换骨的变化。其间,有七八千万中华儿女为实现这一转变而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翻遍世界历史,找不到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有如中国进入现代化所经历的磨难。正是以这样惨烈的牺牲和沉重的代价,才铸就中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所以,我并不为已往的蹉跎岁月叹息,而是一方面为有幸见证中国在 20 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觉得生逢其时;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境况,也是汇聚在 20 世纪中国走出传统的历史代价中的一部分。且不说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社会掌握科学文化的一部分,理应为中国社会的前进付出代价;何况中国直至 1862 年设京

师同文馆,方始出现近代的学校,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止科举制度,知识分子才从“范进式”的“儒生”向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转换。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也要为这一转换付出代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中国社会才真正告别传统。无论历史的惯性运动怎样强烈,也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沉重的历史积淀,中国社会最终冲出传统、迈向世界、进入现代化的脚步是绝不会停止的。正是这样的大环境,才为学术研究的繁荣创造了基本条件。所以,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可以说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回想起1979年春,在上海市历史学会举行的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布哈林是俄国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忠实体现,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更佳选择;所谓“布哈林案件”是斯大林捏造的政治诬陷等意见时,尚很难被学术界所接受。但是,当时我的心是平静的,因为我坚守的原则是:历史研究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历史研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历史研究不能指望“某某人怎么说”作为护身符。自那以来,苏联史研究的条件越来越好,对苏联历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了。可见学术研究的大环境改善了以后,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还是要学者们自己去探索。这里也应了鲁迅先生说过的话:路是人走出来的!

总结一句话: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创造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也给中国的苏联史研究事业带来了真正的勃勃生机。我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名普通人文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体会尤为深刻。由此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改革开放首先是农民得利。其实,知识分子又何尝不得益呢!

入选本文集的文章虽然分为七个专题,其实都是围绕着苏联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实质、矛盾、失败,以及对其全过程的反思这一主题。我皓首穷经,都是力图弄明白苏联 74 年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又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结局这一重大问题。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当然,我也如同一名拼搏在田径场上的跳高运动员:现在只能跳过这样的高度!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虽然欧文在 19 世纪 20 年代就着手将社会主义从天外世界移到现实社会中来,但是在世界上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是苏联,斯大林模式则是第一种在国家范围内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否定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实验时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不能通过道德教化,而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明白地说过,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始终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长年累月地震荡不安。不过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原则性论述中可以体会到,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个和谐的社会、合乎理性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因而就不会再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也不会因为生产关系的阻碍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自不待言,会迅速地、直至极大地丰富起来;由于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由于打碎了束缚人自身发展的种种枷锁,人开始成为自己的主人,逐步成为自由的人。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差别,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在物质财富的分配方面只能“按劳取酬”;但是不管怎样,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危机的,社会政治生活是开明的,每个人的生活是各得其所的。

苏联存在的 74 年的历史,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距实在太太、太大了!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经过 1918 年春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凯歌行进,全国农村经历了“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得到巩固之后,并没有迎来全国的和平生活,而是连绵三年的、残酷的国内战争。我注意到,这不是为夺取全国政权而被迫进行的革命战争,而是发生在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建立之后,发生在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单方面废除和英、法的协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此,国内战争就不是简单的如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暴力是每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暴力,而是新社会诞生以后,新政权所使用的大规模暴力。

1921 年春,讲求实际的列宁终于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承认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并当机立断,全国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但是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由于“剪刀差”过于厉害,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被苏联历史称作“销售危机”的经济危机。销售危机刚刚有所缓解,农业生产危机又尖锐起来,爆发了被苏联历史称作“粮食收购危机”的经济危机,终于导致全国急风暴雨式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把全国农民变为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的准国家农奴。

在这段时间里,联共(布)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斗争,其激烈的程度,更是触目惊心。当时西欧一些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联共(布)党内的斗争何以会演变得如此这般的你死我活,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经过 5 年的争斗,斯大林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反对派,一人独揽全国党、政、军的一切权力。

当斯大林一人能够呼风唤雨的时候,斗争不但没有缓和,苏联社会也没有到此而安定下来,反而掀起了全党、全国规模的大清洗运动。在这场劫难中,全国除斯大林本人以外,包括党政军干部、

科学家、文化人、医生，乃至寄居在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几乎都过着“今天不知明天事”的日子，全国过着噩梦般的生活。当大清洗运动不得不停止的时候，国际风云已经骤变，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势头也咄咄逼向苏联。斯大林虽然纵横捭阖，甚至不惜和法西斯德国签订密约，共同瓜分欧洲小国，但最终还是吃了法西斯德国的大亏，使苏联为此付出本不该如此惨重的牺牲。

面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苏联举国上下，一致奋起，展开气壮山河的卫国战争。卫国战争刚刚结束，苏联人民还沉浸在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欢乐之中，斯大林又开始了新的整肃：如同 30 年代大清洗一模一样的离奇“案件”又一个接一个地制造出来。“如果斯大林再长命几年，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能否活到苏共二十大，还很难说。”赫鲁晓夫讲的这句话，并非危言耸听。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社会也并没有就此平静下来。1953 年 7 月发生了“贝利亚事件”。1955 年 2 月，马林科夫被解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57 年 6 月，发生了未遂的推翻赫鲁晓夫执政的宫廷政变。就在苏联内部的问题还没有理出头绪时，和中国的大论战急剧升温了。20 世纪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相互用最刻薄的语言，争吵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两国的关系到了决裂的边缘。1964 年 10 月，又是通过一次宫廷政变式的“逼宫”，勃列日涅夫取赫鲁晓夫而代之。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 18 年里，苏联国内表面上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官场的腐败越来越甚，斯大林模式从内脏开始往外朽烂。在外部关系上，勃列日涅夫的 18 年却极不平静。勃列日涅夫当政的苏联，和中国走向军事对抗，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大肆扩张，穷兵黩武，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争霸。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还嫌不够，直接出兵阿富汗，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当勃列

日涅夫死后,戈尔巴乔夫允许苏联人民掀开政治黑幕的时候,剧变就不可避免了。

回顾苏联存在的74年里,一方面是作为20世纪崛起的大国,急速地提升国力,成为雄踞世界的一霸;另一方面,作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社会,却是经济危机常态化,极权统治制度化,意识形态宗教化,国际生活霸权化,党内、国内生活几乎没有平静过,连正常的学术研究都要遭到行政命令的干预和禁止,社会更谈不上和谐。20世纪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现实,不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根本难以合拍,即使和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也是背离的。像苏联这样始终矛盾尖锐,动荡不宁,不能安定、安宁,不要说是在现代社会,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不能持久的。因此,苏联前后只有74年的短暂历史,并不是偶然的。

20世纪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什么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出现这样巨大的差异?苏联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为什么不能引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潮流?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还得从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矛盾去寻找答案。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矛盾,本文集的多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过较为明确、具体的阐述,这里,我只想着重解释一下,为什么苏联在改革斯大林模式中,总是进一步、退两步,以致落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种境地。我始终坚持:不能认为斯大林模式一建立,就注定是死定了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作为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实际运作中都是逐步完善的。因此,改革是任何社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环节和途径,改革是任何社会制度得以不断完善的条件。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在于拒绝改革:斯大林在世时,掐死任何改革的思想 and 尝试;赫鲁晓夫改革出现了困惑,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是坚持对的措施,改正错的做法,而是全面回潮,固守斯大林模式,终于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斯大林模式之所以拒绝改革,是因为它有着一种内在的封闭性,它缺乏内在的求生动力。

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经济生活,一方面是“商品荒”,即存在短缺性危机;另一方面是有些产品积压如山,直至霉变、损坏,也即存在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滞销性危机。短缺性危机和滞销性危机的并存,是斯大林模式特有的现象。斯大林模式的这种特有现象,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现象不同,即:它不仅是常态化的,更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导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环节的断裂,斯大林模式的短缺性危机和滞销性危机尽管是常态化的,而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完全由国家以行政权力为手段,以计划为连结的纽带,继续运行。当资本主义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时,工人固然失业,产业主也因此而丧失了获得剩余价值和积累资本的条件,损失了利润,甚至破产。在斯大林模式下,尽管短缺性危机和滞销性危机是常态化的,由于全社会的需求和生产都面对国家计划,和市场隔离,因而不会导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环节的断裂。国家对短缺性危机和滞销性危机,分别通过商品限量配售和银行无抵押贷款,疏通生产和流通渠道。更应当看到,发生“商品荒”的商品,基本上是普通居民的食品和日用消费品。至于国家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国家自会以行政权力,通过计划的方式来保障,也即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生产和供应、不存在“商品荒”的问题(斯大林至死都坚持,认为苏联社会除消费资料以外,都不再有商品了)。因此,短缺性危机只涉及普通居民的生活,因为有权位的阶层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特殊的供应,不会出现“短缺”。这些,是斯大林模式缺少改革的内在驱动因素的症结。斯大林模式自身既拒绝改革,又拒绝汲取自身以外的制度积极因素,它的被淘汰(被开除“球籍”)是社会发展运动的优胜劣败法则的自然结果。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我的研究工作才能较为顺心地进行,研究成果也得以面世。对此,我的心愿已足,原本已别无其他奢望了。由于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我和郑异凡研究员、徐天新教授、杨存堂教授等挚友同仁,又能将以往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结集出版。这样,关心中国的苏联史研究状况,或者想了解中国的苏联史研究的历史的诸位,就可以比较方便地从中一览苏联史研究的概貌。因此,我把文集的出版看作远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中国苏联史研究领域的一件重要工作。基于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因而对以往发表的文章,都照原样发排,仅对个别错字和表述作了更正。这样,这些文章中的某些提法,和现在所能见到的前苏联的相关档案相印证,可能显得守旧了,甚至不确切了。凡此等等,我们(郑异凡研究员、徐天新教授、杨存堂教授和我)都一致认为不宜改动,因为不论怎样,这是我们在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特定的大环境中所走过来的苏联史研究的真实,也是我们认识苏联史的过程的真实。尊重历史,首先是历史研究者尊重自己的以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海市的世界史研究领域,学术气氛始终比较活跃,还成立了世界史学会。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上海市社联副主席武克全研究员支持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关苏联历史问题的几次讨论会,就是武克全同志具体操办的。我的研究工作也得到武克全同志的最早的支持,我一直由衷地感谢。

在整理文集的过程中,重读每一篇文章,都要想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朱庭光研究员。庭光同志是革命先烈的遗孤,从小在新四军的革命洪炉里锻炼成长,铸就了他对事业的

执着。“文革”结束后,在苏联史的研究事业最需要支持、最需要理解的时候,庭光同志作为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苏联史研究人员,通过学术交流形成汇聚起来,逐渐形成一支队伍;他有着深厚的理论和学术造诣,能科学地对待各种不同的见解,提倡在学术会议上开展讨论,不要求统一,更不做结论;他宽容地对待后学,没有领导人的架子,有长者风范。中国的苏联史研究事业,有庭光同志的不能被忘却的一份贡献。

前文已经提到,如果没有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的资助,文集是不可能出版的。此前,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已经资助出版了一批极有学术价值的史学研究著作。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不仅独力建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并且出资、出力,在海内外收集苏联历史档案;组织队伍,翻译、校注、编纂《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组建《苏联史》课题组。此外,沈志华教授还不断资助举办有关苏联历史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而所有这些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来都是由政府出钱,通过各种研究或教学单位组织进行的。沈志华教授所做的这些工作,是由他个人以东方历史研究中心的名义进行的。就苏联史的研究事业来说,能够有像今天这样的发展,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和朱庭光同志有密切关系的话,那么自90年代以来,则和沈志华教授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民营企业”,多种所有制并存,并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现在,民办教育事业也已茁壮成长。我不知道该称“沈志华现象”是什么,也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作“民办科研”。但是,不管怎样,沈志华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个人出资、出力开展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我感谢沈志华教授,不仅是因为他资助出版文集,也不仅是感谢他对学术研究事业的一份痴情,更是赞叹他对我国在建立多渠道科研机制中的一种创新精神。